

◆白城英烈

吕明仁（六）

●胡秀琴

让开大路，转战农村。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企图“控制华北，抢占东北”，频频挑起战事。11月16日占领山海关，11月26日占领锦州，12月27日又占领北镇、黑山。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确定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吕明仁立即召开阜新、彰武、黑山、北镇四县县委书记、县长联席会议，传达党中央、东北局的指示精神，进行思想动员。会后，吕明仁从全局战略出发，奉命于12月30日夜，将地委机关有条不紊地撤出了阜新城，转移到阜北务欢池、平安地、旧庙等地，坚持游击战争。他提出了“坚持地区，坚持工作，坚持游击”的口号。

战略转移到农村，建立农村根据地，干部的思想波动很大。吕明仁耐心细致地进行说服教育，反复阐明中央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主要还是依靠广大的农村，必须经过我们党的艰苦工作，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才能建立农村根据

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是毛泽东同志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和井冈山革命斗争经验证明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只有坚持这条道路，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在吕明仁的启发下，许多干部战士认清了形势，克服了悲观情绪，坚定了革命信心，积极去建设农村根据地。

在农村，吕明仁特别注意密切联系农民、牧民群众，尤其是以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为开展工作的依靠力量，组织农会，培养和选拔当地干部。东北人民被日寇奴役14年之久，对共产党、八路军不够了解，甚至还有怀疑和恐惧。更没有关内老根据地那种“军民鱼水情”的密切关系，还有些群众把将来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吕明仁尖锐地批评了那些不相信群众和缺乏阶级分析的观点。他向干部们说：“群众和我们的关系不密切，他们的觉悟不高，除了敌人长期奴役和欺骗宣传外，就是我们没有尽到责任，是我们不会做群

成语里的中医

闻鸡起舞

●熊建

闻鸡起舞是一个很励志的成语，故事大家都不陌生，说的是东晋时期将领祖逖，年轻时就很有抱负，每次和好友刘琨谈论时局，总是慷慨激昂，满怀义愤。他们在每天一听到鸡鸣，就披衣起床，拔剑练武，刻苦锻炼，只为练得杀敌本领，为国效力。

从中医角度看，这个成语里展示了一种养生方式——晨练，蕴含着一个健康理念——早睡早起身体好，术语叫“夜卧早起”。

中医很重视晨练，要求一年四季都要坚持，《黄帝内经》就说了：春天，广步于庭；夏天，无厌于日；秋天，与鸡俱兴；冬天，必待阳光。晨练时间略有差异，但坚持这一点是必须的。

古人无法精准计时，就用鸡鸣之类的生物节律作为根据，也是人们常说的“生物钟”。闻鸡起舞，那么鸡一般几点呢？俗话说“鸡鸣三遍天就亮”，这一时段大概相当于早晨4点到6点之间。

现代研究支持晨练。从环境上说，早晨室外空气清新，饱含负氧离子，有利于调

整血压、血糖，稳定情绪，改善睡眠。晨练有利于体内毒素和废物的排出，长期坚持，相当于长期给身体进行健康充电、增加生命力的储蓄。

今天城市里的上班族，很多人缺少晨练和其他形式的锻炼，造成身体素质下降，各种疾病高发，非常需要借鉴“刘琨与祖逖，起舞鸡鸣晨”的那股劲头。

闻鸡起舞的舞字，看上去就感觉很轻松，不那么累，说明不是剧烈运动。对于大众来说，晨练不管选择什么形式，都应该以温和不激烈为首选，尤其对于年纪大、体力差的人更是如此。

另外，晨练如果出现一些异常信号，那就说明健康防火墙遇到了挑战，应该予以注意。比如，心率过快、胃肠绞痛，或许是过敏性休克的症状；心率不增加，则预示心脏病的风险加大；规律性头痛、腹痛、胃痛等，应该考虑相关脏器的安危。毕竟，闻鸡起舞为的是报效祖国，可不能把自己先报销了。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众的思想工作，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使自己脱离了群众。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广大劳苦群众就会认识到我们党是他们利益的忠实代表，就会坚定不移跟我们党走。群众是我们的靠山，在城市要依靠工人阶级，在农村要坚决依靠贫下中农。”吕明仁教育干部战士要多接近群众，多调查研究，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实际行动体现党的政策，把党的温暖送到农民群众的心坎上，尽快取得农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他带头为农民担水，扫院子，干杂活。1946年春节，他和地委机关干部与农民一起包饺子，热热闹闹地和群众过了个春节。吕明仁的思想与农民越来越近，感情日益深厚，周围一带群众没有不认识他的，农民一提起吕书记来都说：“他是咱们的好朋友，穷哥们跟着吕书记，什么困难都解决了。”吕明仁为建设东北农村根据地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成为开辟东北农村工作的楷模。

转移到后新邱时，吕明仁得了急性疟疾，一二天犯一次。全身疼痛发冷，几个小时颤抖不停，握不住笔，拿不住东西。他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疾病的折磨，照常坚持工作。同志们都劝他休息，他不肯，一直坚持到病愈。

（一百一十三）
（白城市地方志办公室供）

B 白城记忆

鲁迅、老舍、傅雷怎样做父亲

●李玉辉

以血汗挣饭吃……教他们多游戏，不要紧逼他们读书习字。”

与慈父老舍不同，傅雷可谓严父。虽然在朋友杨绛的印象中，傅雷“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忆傅雷》）。但是，“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阿聪、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小孩，只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小哥俩有时就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缩着脖子认真地偷听。被傅雷发现了也不知，听到傅雷的呵斥后，他们才咚咚逃跑上楼了。过了一会，顽皮的小孩又悄悄回到台阶上偷听了。傅雷发现后，火气三丈，厉声呵喝。原来这小哥俩就是爱听钱锺书说话。傅雷“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冲动下的所作所为，沉静下来会自己责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父亲的爱就是这么复杂。所以，傅聪后来说：“很多朋友若有生活上或感情上的问题，来找我爸爸，他可以是他们最好的良师益友。”“但是，处理自己儿子的事，却毫无办法，一点也不客观。”不过，儿子往往不会记得父亲给予的惩罚，“其实，他当年对我的惩罚，我都记不起，一点也记不起。在父亲狂暴一面的背后，我看到了难以置信的内心的煎熬与磨难，这对我来说——我日后正好成为一个演奏艺术家，恰恰给予我一种能力，使我对人性和‘larger than life’的意义，即柏辽兹（Berlioz）所说，‘灵魂的深渊’，能有所理解及演绎。”若干年后，儿子总会去理解父亲，因为他也要成为一位父亲。所以，傅聪说：“有时候，爸爸说儿子是面镜子，我倒觉得爸爸是一面镜子。”“我爸爸就是我的镜子，我从小就是这样的看着他长大的。”（《父亲是我的一面镜子——傅聪心目中的傅雷》）

傅雷夫妇为培养傅聪的音乐才能，可谓不计代价。他们付出的心血和钱财，一点不比今天“鸡娃”的家长少。为了傅聪学钢琴，朱梅馥卖掉首饰租借钢琴，傅雷则为傅聪抄录厚厚的五线乐谱，并请大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梅·百器教授傅聪。按小时计费的学费费用昂贵，傅雷也毫不顾及。为了傅聪学好钢琴，傅雷“把他从小学撤回”。“英文、数学的代数、几何等等，另外请了教师。本国语文的教学主要由我自己掌握：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等等上选材料，以富有伦理观念与哲理气息、兼有趣味性的故事、寓言、史实为主，以古典诗歌与纯文艺熏陶结合在一起。”（叶永烈《傅雷之死》）傅雷夫妇的辛苦培养，终于成就了蜚声世界的钢琴家傅聪。

做家长没有定法，但是看看这几位文学家的做法，或许可以给“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提供一些借鉴。

（据《光明日报》）

从“拉大锯，扯大锯”说起

●蒋成峰

把作品中的兴看成游戏性的开头，而是试图寻找其与正文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比如将雏鸡与“后妃之德”联系起来，将鲜艳的桃花与美丽的新娘联系起来，从而造成一种“比而兴”的修辞效果，如：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关雎》）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周南·桃夭》）

《诗经》之后，文人诗逐渐成为诗歌的主流，其主要传播方式不是仪式性的表演，而是阅读与吟诵；文人创作重视内容、讲究章法，因而在表现手法上很少使用兴的修辞。但与此同时，在民间仍然广泛流传着各种民歌，这些民歌往往有着特定的表演场合（如歌会、庆典等），具有明显的仪式性和游戏性，在内容上自由活泼、不拘礼法，语言表达中则大量使用兴的手法。例如：

正月里来桃花鲜，好比彩云满山间。红罗包饭来等妹，桃花树下等妹连。（壮族山歌）

井子里绞水桶桶里倒，妹妹的心事我知道。（陕北信天游）

这些歌谣中，兴辞主要被用来确定段落的句式、韵脚、速度、节拍等，使作品在形式上更加统一，以便于传播、唱和；从内容上看，兴辞所述大多是眼前之景、手边之事，而正文则多半归到男女情爱等话题，彼此间并没有明显的语义关联。

总之，兴作为一种语言表达手段，从内容上看体现了追求自由、摒弃理性的游戏精神，在形式上则具有整齐、和谐的仪式感，这些特点决定了它主要用于民间歌谣的创作。从这一点来看，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批评当时的文人创作“日用乎比，月忘乎兴”，其实并不公允。

比的特点及其与兴的关系

作为一种修辞方式，比（比喻）本质上可以看成一种对语义规则的偏离，其关键在于将两个本不相似的事物置于表达“相似”的语言形式中，引领接受者去寻找其内在的相似性，从而感受语言表达本身的意蕴美或趣味美。比喻的语言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表现为词或短语，如“人潮”“花的海洋”，有的表现为简单句，如“人生如梦”“时间就是金钱”。还有的比

喻表现为复句、句群甚至语篇形式。

和兴有关系的主要是由几个子句构成的复杂比喻句——前后相接的两个句子，如果前一句与语境相关，而后一句与之没有字面上的关联，这两个句子中间要是有了“像”“是”等比喻词，就可以成为比喻句，引领接受者寻找二者的语义关联，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一个亡了国的人去安慰另一个亡了国的人，等于屠场中的两头牛相对哀鸣。（老舍《四世同堂》）

如果这样的两个句子中间没有比喻词，解读起来就会有多种可能性，需要读者花费更多的认知努力来建立二者的语义关联，造成更加含蓄的表达效果。例如美国诗人庞德这首著名的《在一个地铁站》：

人群中这些面庞幽灵一般闪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朵朵花瓣。

有的句子本身没有问题，但却看上去与所处语境没有关联，要理解这种句子，就要接受者自己去发现它的隐喻义，从而形成一种只有喻体的“借喻”形式。如下面例中孔子所说的玩笑话：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

借喻的理解往往需要足够的背景知识和推理能力，而现实中很多人并不具备这种素质，所以有的借喻句会在后面加上一句话，显示其真实含义，从而形成一种喻体在前、本体在后“倒喻”（或称“引喻”）形式。如：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从语言形式上看，这种比喻和《诗经》中那些兼有比的兴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这一类修辞其实是比和兴的融合：从语义上看，前后两句所述事件性质完全不同，然而它们的并置却可以使人发现其内在的语义关联，从而构成了比喻；而从形式上看，开头的句子和后面的句子没有直接的语义关联，不能衔接连贯，因此形成了起兴。

事实上，由于比和兴本身具有不同的生成机制，所谓“比显兴隐”其实只是兼有比的兴（即倒喻）和本一般的比喻进行比较的结果。在一般比喻句中，喻体处在本体之后，是认知上比较突新的信息，要想理解整段文字的意义，就必须使喻体得

骏马奔腾春色丽，艳阳照耀岁华新。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背起行囊出发，背包里既有2020年的满满回忆，也有对2021的热切期盼。

却顾所来径，2020年初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疫情面前，我们看到的不仅有白衣执甲的逆行战士、无私无畏的解放军和公安民警、坚守岗位的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争分夺秒研制疫苗的科学家，还有无数以笔为援的文艺工作者。逆行武汉的报告文学作家，将抗疫前线的所见所闻用文字第一时间传递给读者；深入武汉定点医院、隔离病房的摄影家用66天时间为4.2万余名白衣天使造像，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一首《武汉伢》更是唱出了大江南北的人们共同的心声……朴实的文字、生动的画面、高亢的歌喉、动人的表演，凝聚起战疫必胜的决心，定格下一个感人至深的瞬间。

回顾过去一年，“云”是当之无愧的关键词。虽然不少线下文化活动按下暂停键，但人们发现，云演出、云录制、云直播、云展览、云综艺、云阅读却是精彩无限。不论线上演出、影视剧展播，还是非遗直播、云游博物馆、云游出版社以及线上公共课、有声书、云讲座，“互联网+文化”生机勃勃。在疫情这次大考面前，文艺工作者和文化产业从业者积极拥抱数字时代，推动文化与技术的深度融合，催生出不少新鲜有趣又彰显文化底蕴的线上文艺新形式。通过有效提供线上公共文化服务，不仅满足了疫情期间大众的文化需求，更让云直播、云看展、云学习等成为新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为文化产业数字化积累了宝贵经验。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推进文化产业“上云用数赋智”，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扩大优质数字文化产品供给。过去一年，国产游戏深耕传统文化，在寓教于乐中传播中华文化；网络小说精耕细作成趋势，“走出去”表现抢眼；文创产品花样翻新，市场规模日益扩大，IP改编如火如荼，版权经济迎来发展新局面；相关法律法规日益健全，为文化产业发展保驾护航……我们正向着文化强国的目标坚实迈进。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也是时代忠实的记录者。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胜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我们看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记录下这伟大壮举和历史进程。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抗击疫情等主题，全国国有文艺院团创排了4000余部优秀现实题材作品；电视连续剧《花繁叶茂》《最美的乡村》、纪录片《脱贫攻坚决战》《落地生根》等引发广泛关注；中国作协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圆满完成，25位作家用文字镌刻下雪域高原、南疆大漠、中原大地的脱贫故事……在扎根基层的过程中，他们也感受到乡村实实在在的变化。农家书屋、露天戏台、乡村文化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正向零门槛、均等化、普惠制深入发展，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进一步增强。一些艺术家深入乡村，或是帮助村民开展艺术创作，将扶贫与扶智相结合；或是用艺术设计改善村容村貌，赋彩美丽乡村；或是协助开发手工艺文创产品，打通销售渠道，用艺术的力量赋能乡村振兴。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新的一年里，亿万人民正勠力同心、整装待发，向着文化强国的的美好愿景迈出坚实步伐。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一推一拉，木屑纷飞，地板线条，地上堆起高厦，千百万间，辛苦拉锯，智慧谁何，团结同心，共创美好。



拉大锯图

何大齐绘

到与语境相适应的解读，这样一来，喻体的意义就显得鲜明且确定；而在兴（倒喻）中，兴辞（喻体）处在话语的开头，是信息传递的背景，从一定意义上说，如何解读背景信息对于话语的理解并无根本性的影响。对于《诗经》中的兴来说，有的人（如经学家郑玄等）倾向于把它们与特定的背景知识建立关联，甚至认为所有的兴都是有特殊含义的比；而一般读者则主要凭借自己的日常经验来进行解读，发现部分兴辞与正文语境存在语义关联；还有的人（如现代的顾颉刚等）则拒绝承认兴辞的比喻义，认为所有的兴都只是个起头而已，似乎也并无不可。这一点，应该就是“比显兴隐”的实质所在。

（据《光明日报》）